1.

中南亚：地缘政治文化的考察（代序）

关于“中南亚”，我们定义为在我国新疆境外附近的中亚五国、包括车臣在内的高加索地区、伊朗、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拥有大量穆斯林的印度西北部。

这是丝绸之路的要冲，东西文明在这里碰撞；

这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多元文化在这里融合；

这是宗教传承的胜境，这里的伊斯兰教绚丽多彩。

这一深厚的历史底蕴决定，阿富汗经常处于中南亚地缘文化的枢纽，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中南亚地缘政治的枢纽。

□潘志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们在《周边环境与新疆稳定》2001年年度报告中开篇写道：

2001年注定是个非常之年，其“非常”不是因为它是世纪、千年之初，而是这一年在美国的心脏纽约、华盛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9·11”或许是世界历史的划时代的转折点，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但毋庸置疑的是，国际大环境从此发生重大变化，并至少影响今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9·11”后，“反恐”军事打击在阿富汗如火如荼，全世界聚焦于紧贴新疆的这个我们的邻国。

阿富汗面积65万平方公里、2100万人口，在当今近二百个国家中毫不起眼。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那是一片贫瘠的土地、一个内陆的山国、一座穆斯林的家园，其政治走向、经济发展，怎么说也是无足轻重的。事实上，自1919年宣布独立以来的大多数时期里，它成为地缘政治的死角、“盲肠”，鲜为世人所关注。如果说‘9·11’前，阿富汗那里出点像样的新闻，好像有两条：一是1979年底，苏军大炮坦克隆隆开进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的角落，从而引起连绵的‘圣战’之火；二是2001年春，塔利班武士向举世闻名的巴米扬巨佛宣战。在地缘政治学者那里，研究西亚的，兴奋点在中东的巴以和海湾诸国；研究南亚的，注意力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研究中亚的，更多地分析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非南亚、非中亚国家，似西亚国家，但似乎没有多少人把它认真地当作西亚国家来研究——可以说，阿富汗经常成了地缘政治的‘盲区’。然而，“9·11”后，阿富汗几乎一夜之间，从地缘政治的“盲区”变成焦点。如果将‘9·11’中的本·拉丹所为比拟为“盲肠炎”的恶性爆发，那随后的美军的军事打击就仿佛是一场地缘政治的“外科手术”。阿富汗的地缘政治位置问题，由此很突出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而更深层的问题是，应怎样重新思考、分析与我国西部连接的广大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阿富汗：地缘政治的位置？

阿富汗的地缘政治位置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西亚”说

国际问题观察家，特别是我国的研究者习惯将亚洲分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五大块，阿富汗在西亚。此说不无道理。直观上看，阿富汗地理位置在亚洲的西部，特别是从19世纪末俄国与英国在亚洲腹地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后，阿姆河就成了西亚伊斯兰国家与苏俄之间的一道森严的地缘政治界线，这一百多年里，阿姆河南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愈走愈远，成为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大中亚”说

阿富汗也可以说在亚洲的腹地或中部，至少阿姆河左岸的阿富汗北部属自然地理范畴的内陆亚细亚。阿姆河作为两个世界的森严界线一直持续到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十年后苏军狼狈地退回阿姆河以北，但同时这条森严的地缘政治界线被打破了。此后，在新独立的中亚国家里发生的伊斯兰复兴浪潮、塔吉克斯坦内战、阿姆河两岸的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的互动以及“三个主义”从克什米尔、阿富汗到中亚费尔干纳谷地连成一片等，国际观察家愈来愈难以将阿富汗一带的问题与中亚截然分开孤立分析。于是有阿富汗属于‘大中亚’的说法，甚至有人干脆把‘9·11’后的阿富汗战争说成是‘中亚反恐战争’。

“大中东”说

西方人通常以其视角向东看，依次有近东、中东、远东之说。近东(Near East)之说似乎盛行于19世纪末，指当年的奥斯曼帝国的包括东南欧、北非的领地。中东（Middle East）为美国地缘政治学学者马汉于1902年首次使用，指波斯湾周围地区，后来随着‘近东’概念的淡出，“中东”却愈弄愈宽泛，它可以包括

“土耳其到亚丁和中亚到摩洛哥这个大范围以内的任何地区”①,是为“大中东”。如两个美国学者所言:“我们称之为‘中东’的那个地区,在中国人看来是‘西亚’,只是从伊拉克和伊朗穿过中亚直到中国西北部的新疆这样一个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而已。”②西方已比较习惯于将俄罗斯之外的亚洲以“中东”和“远东”分别称之,其中似有地缘文化的意思,也就是说,相对于中东伊斯兰文化圈,包括中国、日本的“远东”意味着为佛教文化圈。

以上这些说法各有其理,但愈来愈不适应近二十多年,特别是“9·11”后国际局势与亚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于是又有新的说法出现。

“大亚太”说

为打击塔利班,美军进驻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不仅直入俄罗斯的传统“后院”,也对中国构成三面包抄之势。面对这一地缘政治的新形势,有学者提出“大亚太”的概念。近年“亚太”的提法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愈来愈盛行,现有论者提问:“亚太”到底有多大,认为:“作为地缘政治板块,亚太本身是个开放性的动态概念。二战前,人们多以‘远东’和‘东亚’两个概念指称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其地域范围主要包括中、朝、韩及东南亚等西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国家。第二次大战后、尤其是冷战后,因区域整合加快、加深及区域经济、政治和安全辐射面普遍增大,联系面拓宽,‘远东’和‘东亚’这两个传统概念已鲜为人们提及,亚太概念开始盛行。随着相关国家对参与亚太事务的兴趣增大,亚太在地域上所涉及的国家呈不断增加之势,地域涵盖范围渐由模糊到清晰,并呈继续扩大之势。有学者提出亚太地域范围除传统的‘东亚’国家外,应包括俄罗斯远东部分、南亚和大洋洲。还有人明确认定现在的亚太范围囊括

① 杰拉尔·豪厄特:《世界历史词典》,240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② 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12页,新华出版社,1997年。

‘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和北亚，以及太平洋上的澳大利亚等四十余个国家’。简言之，阿富汗和中亚本身已在政治地理学意义上成为亚太的一部分。从大亚太观点看，阿富汗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发生在亚太的战争，含有明显的亚太地缘政治意义。’① 诚然，“大亚太”观的提出，对于从宏观上分析阿富汗战争及其后果，美国的地缘战略调整，欧亚和亚太地缘战略格局变化，较为方便，但问题更大：其一，阿富汗和中亚在地理上距太平洋毕竟太远，“大亚太”的构思，未免大得离谱；其二，“大中东”将北非至印度河看成铁板一块的伊斯兰世界，虽有地缘文化的考虑，但已明显粗糙，而“大亚太”的提出，完全不顾及地缘文化的底蕴，粗得离谱；其三，“西亚”说、“大中东”说、“大中亚”说的共同问题是，不同程度地将阿富汗及其附近地区边缘化，而“大亚太”说则是将这一地区的边缘化推至极点。

“帕西”说

相比之下，近年，我国学者安维华教授提出“帕西”说，并写了一系列文章，非常有意义。所谓的“帕西”相对于属中国的“帕东”，安教授定义为：“帕米尔高原的西部地区以及其以西的接邻地区，属中亚、西亚、南亚以及东亚四区之间的接合部，涉及中亚五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以及里海地区其他国家。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控制区均与中国接壤。”他认为，在过去一个时期研究中，本地区是分别划入中亚、西亚和南亚等地区而进行单独的考察。在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下“继续采取对这一地区进行分区（中亚、西亚、南亚）研究的方法，已不能适应要求。有必要将帕西这一区间地区，或接合部地区，作为一个‘单元’，即帕西地区进行综合的考察。”

“中南亚”说

我们认为，“帕西”的思考很有见地。鸦片战争之际，清代著

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01/2002）》，67～68页，时事出版社，2002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名思想家、学者魏源(1794～1857)在所著的《圣武纪》写道：

> 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维吾尔）北准（准噶尔）而外地则以葱岭(帕米尔)为纲,东新脸西属国。属国中又有二：由天山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为左右布鲁特（柯尔克孜），虽同一游牧行国，而非准非回非蒙古矣。逾葱岭而再西北为安集延（乌兹别克）；西南为巴达克山，为爱乌罕（阿富汗）；虽亦皆回教城郭之国，然岭以西之属国非岭以东之郡县矣。

葱岭即帕米尔,安教授的‘帕西’‘帕东’与魏源的‘葱岭为纲，东新疆西属国’的说法相当地吻合，但我还想进一步讨论。我认为，印度的西北部包括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也应归于这一‘单元’。由此而来的问题是,这一广大地区不仅仅在‘帕西’,有的在‘帕北’,如哈萨克斯坦,有的在‘帕南’,如克什米尔至印度西北一带。此外‘帕西’之‘西’到何处,也是个问题。前些年,我曾提出‘内亚’的概念，但那是另一种分析的考虑。① 再三斟酌，我们试引出‘中南亚’的概念,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相提并论，姑且将‘中南亚’大体界定在我国新疆境外附近的中亚五国、包括车臣在内的高加索地区、伊朗、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拥有大量穆斯林的印度西北部。以下试图从这一‘单元’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这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中南亚的地缘政治

讨论中南亚的当前的地缘政治似应从冷战后的国际大背景切入。

①所谓的‘内亚’，定义为‘土耳其、高加索的阿塞拜疆、俄国的靼挞斯坦、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我国的新疆’。这主要是着眼于‘双泛’的历史文化考察、因此，土耳其和新疆在内，而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伊朗不在其中。参见潘志平：《中亚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思考》，《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3期。

三个基本动向

冷战是以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对抗的终结而结束，但世界仍不太平。在后冷战时期，原有的世界力量对比出现明显的失衡，原先被掩盖的民族、宗教矛盾凸现、失控，国际关系格局并未定型。其中比较明显的是三个基本动向在恶化国际大环境：

其一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寻找新的“敌人”。冷战虽已过去十年，但冷战思维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些人那里总是挥之不去，它们在因苏联解体失去‘对手’后渴望新的‘对手’，并在全世界寻找‘敌人’。政治稳定、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愈来愈被认为是‘美国的新敌人’。这些年来美中关系风风雨雨，并影响到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都是这个问题在作怪。

其二是世界性的民族分立主义（Ethnic Separatism）泛滥。苏联解体标致着冷战结束，随着苏联一分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出现了当代民族分立主义高潮。这是在殖民体系完全瓦解、彻底崩溃的背景下，以民族自决为口号在多民族主权国家里，搞民族分离、分裂、独立的极端民族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分立主义闹得最凶的地方总是有西方大国干涉、插手的复杂背景。

其三是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泛滥。确切地说，自 70 年代末中东地区兴起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并很快地蔓延自北非至中亚、东南亚的广阔地带。一般文化意义上的伊斯兰复兴，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还不是直接问题，但它往往营建一个极浓厚的宗教狂热氛围，而在这种氛围下，它极易政治化、组织化甚至恐怖主义化。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运动是政治化、组织化和恐怖主义化的伊斯兰运动。

中南亚的三股势力

在上述国际大背景下，三个“主义”（即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或曰三股势力，在新疆境外一带的中南亚地区崛起。

民族分裂主义

苏联解体后，民族分裂的势头仍在继续，克什米尔、车臣的分离运动突出地表现为宗教极端化和恐怖主义化。

宗教极端主义

苏联解体前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由中东地区蔓延至前苏联的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复兴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伊扎布特”(Hizbut Tahrir)相继涌现，这些极端组织一般都具有浓厚的泛伊斯兰或伊斯兰原教旨色彩。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运动是政治化、组织化和恐怖主义化的伊斯兰运动，其本质是极端政治运动，而不是宗教运动。其基本特征是：通过鼓吹“圣战”思想实施恐怖主义，以达到建立由宗教精神领袖统治的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权的政治目标。

国际恐怖主义

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的中东地区。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资助、培养了一大批包括本·拉丹‘基地’组织在内的国际恐怖分子。苏军撤退后不久，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成为中南亚地区国际恐怖主义的大本营。国际恐怖主义都具有鲜明的政治目标，有组织、有计划地不加选择地采用爆炸、绑架、劫机、投毒、暗杀等残暴手段袭击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在内的平民和政府行政、执法机关，企图制造大规模的恐怖气氛，从而将其政治信息传递给更广泛的群众，以实现其罪恶的政治目标。有无政治目标是界定恐怖主义的重要标尺。

历史和现实上，宗教极端主义经常同极端民族主义共生一体，如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共生；伊斯兰原教旨极端主义与各种类型的民族分裂主义相勾结，而这些极端民族主义又不同程度地原教旨主义化和恐怖主义化，从阿富汗到车臣、从乌兹别克斯坦到克什米尔，中南亚一带恐怖主义的政治目标不是民族分裂，就是宗教极端 有的既搞民族分裂，又搞宗教极端，因此中南亚这一带的三股势力总是错综复杂地缠在一起。

四座“火药桶”和恐怖的“双月”带

近些年来，由于三股势力的横行，中南亚地区形成四座“火药桶”:

阿富汗

近 20 年来一直处于内战分裂之中。在前苏联军队撤出之后，圣战者组织间发生旷日持久的内讧，塔利班由此崛起，并很快攻占了包括首都喀布尔在内的阿富汗大片土地。塔利班与国际恐怖主义大亨本·拉丹沆瀣一气，将阿富汗大部分地方变成国际恐怖分子的乐园。“9·11”后,塔利班政权受到沉重打击,已不复存在,但‘基地’组织的残余分子还在活动,只要这伙国际恐怖分子不根除，阿富汗国就无宁日，周边地区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

费尔干纳

这个与我新疆南部喀什、克孜勒苏地州一山之隔的谷地，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所分割，地形复杂、人口稠密、经济落后、社会问题严峻、伊斯兰传统宗教极端势力根深蒂固，历史上又是小股匪徒“巴斯马奇”猖獗活动过的地区。近几年来它成为三股势力肆虐的地方，并非偶然。

克什米尔

克什米尔问题是半个世纪前英国殖民者离开这里时制造出来的难题。印巴两国独立的第二天就为争夺克什米尔开战，结果是在 1949 年固定下的军事控制线左右各占一部分。五十多年来这两个国家在这里大战三次，平日的冲突、磨擦始终未断。近几年，克什米尔分离运动原教旨主义化、恐怖主义化，使这一地区局势陡然紧张，甚至于‘9·11’后,印控克什米尔恐怖暴力还持续升温，已到了爆炸的临界点。

车臣

车臣民族分立主义崛起苏联解体之初。1991 年 11 月,车臣

单方面宣布独立，俄罗斯联邦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994年底，俄军进剿车臣，但战事不利。至1996年8月，俄与车臣达成停火协议，将车臣地位冻结五年，俄罗斯视为痛苦的车臣战争结束，但车臣民族分立主义却以为一场伊斯兰圣战刚刚开始。具体地说，1995年的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是车臣民族分立主义原教旨主义化、恐怖主义化，即由原先"自决"、"独立"变为恐怖的"圣战"。此后，车臣匪徒的活动蔓延至俄罗斯的中心地区，甚至于把炸弹扔到莫斯科，气焰甚嚣尘上，迫使俄罗斯联邦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围剿，是为第二次"车臣之战"。2000年初，俄军解放格罗兹尼和车臣全境，车臣民族分立主义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被粉碎，但残余分子仍在北高加索山区与俄军周旋。其中还有一些残匪流窜至阿富汗和中亚等地。车臣"后遗症"严重存在，影响是深重的。

三股势力兴风作浪，四座"火药桶"遥相呼应，在中南亚地区形成恐怖的"双月"带：

车臣——中亚——阿富汗。

吉尔吉斯斯坦一乌兹别克斯坦一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

这两条月牙形的焦点在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其前沿在我南疆边界正对面的费尔干纳谷地。须注意以下几点事实：

一，塔利班是世界上唯一"承认"车臣的"政权"，车臣武装分子既得到塔利班的武器装备的支援，又在塔利班的武装基地受训。

二，中亚的极端、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在塔利班那里设有后方基地，接受塔利班军事上的支援，其战士还参加阿富汗内战，与塔利班并肩作战。

三"东突"恐怖分子在塔利班地面也设有训练基地，并参加阿富汗内战、车臣战争和IMU的反政府军事行动，IMU的基地加尔姆、吉尔加塔尔、塔维尔达拉和1999—2000年出击的巴特肯山区，距我边境伊尔克什坦也仅有200多公里。从这一点看，

新疆已处于反中南亚三股势力的第一线。

近二十年的阿富汗内战始终牵动着中亚、南亚国家的神经，所谓的“6＋2”会议，就是阿富汗周边的国家加上美国和俄罗斯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例会。“9·11”后美英打响了针对塔利班的反恐战争，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所有的情况说明，随着最近几年国际政治的发展，阿富汗已成为中南亚地缘政治的枢纽。

中南亚的地缘文化

在讨论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时，我们引出“中南亚”这一概念。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当代政治分析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关于这一广阔地区的地缘文化的考察。

这是丝绸之路的要冲，东西文明在这里碰撞。

如众所周知，古代有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两河埃及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中南亚立足于印度河，处于东西古文明的中间地带，受到诸大文明的影响和作用：一方面它是周边诸大势力的缓冲结合地带，另一方面将相互远隔的诸多文明连接起来。这种相互关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明显地表现在经济、文化上。丝绸之路正是这种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来的，它将古代人民东西友好的往来概括得既形象又富于诗意。但这终究是个艺术化了的概念，和任何美好的东西一样，总有其不足之处，至少它容易引起人们误解：以为这只是一两条仅仅展开丝绸贸易的商道，以为15世纪后海路交通兴起后，它就衰落了，断绝了。但这些认识过于狭隘或缺乏充分根据。其实，丝绸之路上远远不止丝绸贸易，海路交通兴起后也并不意味着东西陆路交通的衰落乃至断绝。中世纪以来大黄、茶叶贸易曾在丝绸之路上繁荣兴旺了近千年，就是一证。

丝绸之路实际上是由许多平行的纵横相连的交通网络构成的。中南亚的古代部落、城镇，如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奄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里海、咸海间)、者什(塔什干)、赛蓝(乌兹别克斯坦希姆肯特)、花拉子模(乌兹别克斯坦希瓦)、迭儿密(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康国(撒马尔罕)、安国(布哈拉)、拔汗那(费尔干纳)、但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江布尔)、碎叶(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木鹿(土库曼斯坦马雷)、俱战提(塔吉克斯坦苦盏)、罽宾(克什米尔)、呼罗珊(在伊朗东北)、你沙不儿(伊朗内沙布尔)、缚喝(阿富汗巴尔赫)、迦布罗(喀布尔)、哈烈(阿富汗赫拉特)、健陀逻(巴基斯坦白沙瓦、拉瓦尔品第)等等,就是丝绸之路上过往商旅的交易地或驿站。可以说,古丝路横贯东西,中南亚为其之要冲。

这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多元文化在这里融合

考古学家在巴基斯坦的索恩、阿富汗的达希迪纳乌尔、伊朗马什哈德附近的克谢夫河谷、北印度的昌迪加尔、土库曼斯坦西南、塔吉克斯坦的奥格泽基奇克、南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拉套、哈萨克斯坦的赛密兹布古等地挖掘出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专家的意见是,这一地区"即使不是人类起源中心之一,也至少是早期人类居住的一个地区。"①

历史上这一地区民族迁徙频繁,有的来自中东方向,表现为波斯阿契美尼德朝、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朝和阿拉伯帝国向中南亚的入侵、殖民活动。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更多的是来自东方的游牧民的南下活动。整个欧亚大陆的自然地理的明显特征是北部自蒙古草原至南俄草原绵绵不绝数万里,南部则是农业区。在中南亚,北部辽阔的哈萨克草原向东通过阿勒泰草原联接蒙古草原,向西与南俄草原毗邻;南部则是戈壁、沙漠和其中星星点点的绿洲农耕区,锡尔河、咸海一线大体是它们的分界。如学者所言:"定居区为绿洲,游牧区广袤无垠,这就是处于几个文明之间的广大地区的普遍特征。"② 草原游牧人、骑马民族始终在游牧中运动着,从一块草地到另一块草地,

①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第一卷,第2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②克林凯特:《丝绸古道上的文化》,第8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同时不时地一股股地南下到农业区，与农耕的土著民融合中定居下来。自遥远的古代，这里就是民族迁徙、融合的走廊。约公元前两千纪中期，亚利安人经由中亚南下，一支入伊朗高原、一支入印度。其后，中亚北部草原上游牧民塞人、大月氏、乌孙、呎哒、突厥、蒙古、乌兹别克等部一浪一浪地南下，在这一带建立贵霜帝国（1～4世纪）、呎哒强国（5～6世纪）、西突厥汗国（6～7世纪）、萨曼王国（874～999）、伽色尼王国（936～1186）、塞尔柱突厥帝国（1055～1157）、花拉子模王朝（1200～1220）、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帖木耳帝国（1370～1405）、莫卧儿帝国（1526～1761）和乌兹别克诸汗国等。

如前所述，古欧罗巴人是中南亚地区最早的居民。亚利安人、塞人，甚至还可能有月氏人、乌孙人，都是印欧人种。古代历史上许多情况极其模糊，一位学者的论断是极富启迪意义的，那就是："中亚的畜牧业游牧民族，与亚洲边缘上高度农业文化之间的交替表演，就成了亚洲历史的节奏。"① 一些游牧部落，特别是蒙古高原上的部落，不断结成强大的部落联盟，建立起一个个草原"行国"，在短时期内聚集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威胁过南方的农业区，也即中国中原地区，但在遇到中原中央王朝强有力地阻遏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转向西南，扑向戈壁、沙漠中的绿洲。总的来看，草原上的游牧"行国"骤然崛然，而又很快衰弱，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南部绿洲中的城镇是某种较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体现者，他 不仅吸收了新的技术和思想，而且还把这些新技术和思想传播给邻近地区。比如在这些绿洲中至少发现过16种语言和24种文字书写的文书。绿洲是不断受到威胁的，因此它的居民生活的狭小天地，既是内部平静的封闭小世界，也是动荡不定的大海中的一个个孤岛。"永世流动"是游牧民的信念，但是"任何地方也不要定居"既然是成吉思汗"钦定"的法令，那末从反面证明，游牧

①克林凯特：《丝绸古道上的文化》，第8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民南下走向定居，是一种难以遏制的历史趋势，迁徙走向定居就意味着融合，这里最重要的标志是中南亚北部的突厥化。

突厥化的正确含义是，历史上一些人们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失去了自己原先的语言，成为操起突厥语的“突厥人”。学者举例说，黠戛斯人原先不是“突厥人”，而后来被突厥化了。也就是说游牧的“突厥人”来到绿洲与当地的操东伊朗语居民通婚、混血，使突厥语成为当地普遍使用的语言。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其实现至少有两个前提：一是游牧的“突厥人”改变原来的游牧方式转入定居，二是“突厥人”要改变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接受当地人信仰的伊斯兰教。因为，只有定居，与当地人杂居，方可便于通婚、融合；而且只有改信仰伊斯兰教，方可能够通婚、混血。一般而言，不同宗教信仰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妨碍通婚，何况穆斯林妇女尤其不能嫁给异教徒。因此，中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大体是同步的，并相互促进的。

在俄英殖民者来到之际，中南亚的民族主要有两类基本成分：处于北部的操突厥语诸民族，如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处于南部的操各种印欧语的民族，如操伊朗语的塔吉克人、普什图人和操印地一乌尔都语的旁庶普人、俾路支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横跨阿姆一喷赤河（现代中亚国家与阿富汗之边界）而居，这条大河正是这两类基本民族交叉杂居之地。作为巴基斯坦官方语言乌尔都语，本是印地语的方言,在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以来,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的大批词汇涌入其中，并使用阿拉伯一波斯文字母书写，而形成了一种独立的语言。而中南亚现代操突厥语诸民族的形成过程中除了继承了突厥、蒙古渊源外，也接纳融入了不同于突厥、蒙古的本地印欧语族的渊源。他们不简单地是古代原住民的后裔，但也不是没有关系。正如学者精辟之见：他们“既是外来的，也是本地的。”[①]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中南亚民族史就是一

①王治来：《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西域研究》，1997 年第 4 期。

部民族迁徙史，土著和非土著却是某一历史时代的相对概念而已。

从审视历史长河的角度看，多元民族的融合，多元文化的整合，应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总是伴随着激烈的民族冲突而付出血淋淋的代价。当我们翻检那个时代的史书，那些为汗王、艾米尔歌功颂德的“武功记”，历历在目的是刀光剑影、生灵涂炭和赤地千里，一幅幅恐怖、血腥的图景。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暴行是帖木儿大帝发明的“人头塔”。1387 年攻占伊斯法罕时，他命令麾下军士将 7 万名和平居民斩首，把他们的头颅堆积成金字塔。1401 年在镇压巴格达人民反抗后，在过古尔邦节的那天，他命令军士斩 9 万人首级，用人的头颅砌了 120 座金字塔。史书记载，在辽阔的帖木耳帝国中有无数这样的人头塔①。人头塔对于被征服者有极度的震慑力，故此自帖木耳以后，堆砌此塔之风在中南亚蔓延。1757 年布哈拉艾米尔穆罕默德·拉希姆在远伐吉萨尔时，把俘虏全部砍头，堆成一座巨大的人头塔。时过 200 年后苏联学者调查发现，关于这座人头塔的恐怖图景仍遗存在当地居民记忆之中②。

这是宗教传承的胜境，这里的伊斯兰教绚丽多彩

前文我们已谈及丝绸之路，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丝绸之路的内涵在于它所体现的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其中最瞩目的是由西向东传播的宗教文化。源于古代波斯的祆教、摩尼教、景教和源于印度的佛教，都是通过中南亚这个丝绸之路的枢纽向东传播。其中有三个情况尤其引人注目：一是佛教以其博大精深，特别能兼容并蓄，在公元前后的近千年时期在中南亚产生最深刻的影响；二是佛教传播时通过古希腊人在今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建立的大夏国，发展成一种希腊佛教（也有罗马因素）的艺术，这个艺术之光还照亮了更远处；三是祆教、摩尼教，还有部族的原始宗教在中南亚并存，和平共处，其间也有可能在这

① 伊万诺夫：《中亚史纲》，第 101 页，莫斯科，1958 年。
② 同上。

几个世界观完全不同的宗教之间，出现奇特的结合，例如在佛教寺庙中设置祆教拜火祭坛，就证明了这一点。随着伊斯兰教的崛起，中南亚迅速伊斯兰化，其他宗教虽未完全绝迹，但伊斯兰教成为这一地区主要宗教地位却是越来越牢固。伊斯兰教在中南亚落地，同历史上所有曾在中南亚传播的宗教一样受到欢迎，表明这是个宗教传承的胜境。当然，此胜境中并非都是人间乐园。比如， 1512 年波斯‘红头军’(克孜尔巴什)攻占卡尔希后屠杀了城里的所有居民，儿童、老人、妇女也不得幸免。当时还有一些被尊崇为“圣裔”(穆罕默德后裔）的赛义德们躲藏在清真寺内。可指挥什叶派红头军的巴布尔汗发令：“当圣战的勇士用武力占领任何一个地方时，都要把这个地方的居民斩草除根。这样做时是不分什么赛义德不赛义德的。”于是红头军的兵士们冲进清真寺，把赛义德们的头一个一个割了下来①。透过什叶派红头军滥杀‘圣裔’的悲惨事件,可以看清‘圣战’与宗教斗争的本质。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中南亚大体上属于伊斯兰世界，但是它只是这个宗教的传播、扩张区，与伊斯兰教的原发地阿拉伯半岛相比，文化背景确有相当大的差异。伊斯兰教文化进入中南亚是叠化在当地多种文化层之上。中南亚本土的多种文化必然在“改造’伊斯兰教。在伊斯兰的‘宝剑’和免纳人头税的硬软功夫下，当地居民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而皈依伊斯兰教，并由此改变了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总不免把一些传统的思想带进伊斯兰，形成有中南亚特色的伊斯兰教。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有着佛教、摩尼教的明显影响，依禅的活动有原始萨满教的东西，什叶派的观点具有摩尼教灵感论和古伊朗其他宗教思想的烙印，摩尼教艺术很明显地继续存在于伊斯兰细密画之中，伊斯兰清真寺的建筑有借鉴佛教寺院的东西。伊斯兰在中南亚本土化，使自己在中南亚完全扎下

① 艾哈迈多夫：《16～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第 44 页，塔什干，1985 年。

根来，同时它又因此丰富多彩。中南亚特色的伊斯兰教不仅意味着多元民族的融合，而且也体现了中南亚多元文化的绚丽多彩。

结论

从地缘文化看，阿富汗的伊斯兰与其认同于西亚，毋宁认同于中亚和被认为南亚的巴基斯坦和北印度。事实上，在前伊斯兰时代，巴克特里亚(阿富汗)、索格地亚那(阿姆河、锡尔河的‘河中’地区)、健陀罗(印度河流域)一带同为居鲁士波斯帝国、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塞琉古国、安息国、萨珊国的东方边区。伊斯兰化以来，它们则同是阿拉伯倭亚马朝、阿拔斯朝的东部行省。而中南亚地区历史上最辉煌时期是贵霜帝国、帖木耳帝国和莫卧儿帝国。贵霜帝国以富楼沙(今白沙瓦)为首都，据有中南亚，是与当时中国东汉王朝、波斯安息王朝和罗马帝国并列的四大国之一。帖木耳是突厥化的蒙古人，他以撒马尔罕为中心四处征伐，建立起北迄咸海、里海，南抵印度洋的印度和小亚细亚之间的庞大帝国。他死后，其子定都赫拉特，即《明史》中的哈烈国。16世纪初，帖木耳帝国在北方乌兹别克人的打击下崩溃，帖木耳的六世孙费尔干纳王巴布尔退往喀布尔，在复国无望的情况下转战印度，建立由印度到阿富汗的大帝国。此后的乌兹别克布哈拉汗国的领地还一直延伸至兴都库什山北的阿姆河左岸。

因此，这一深厚的历史底蕴决定，阿富汗经常处于中南亚地缘文化的枢纽，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中南亚地缘政治的枢纽。19世纪末，英俄在亚洲腹地展开激烈地争夺，在阿姆河一喷赤河一线划出一条森严的现代国界，划断了其左右的政治文化联系，其副产品是阿富汗被边缘化。当1979年苏军坦克跨越了这条国界时，固有的地缘文化联系随之就不可阻挡地浮出水面。明了这一点，就不会对阿富汗内战强烈影响到周边的安全稳定，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三个“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